

知識天地

從雲南移民的走私貿易看緬甸的日常政治

張雯勤助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在 1988 年以前緬甸歷經了近四十年的封鎖，期間是由尼溫所領導的社會主義政府（1962-1988）。由於尼溫政府實行國有化經濟，致使全國經濟崩潰，民生所需物資有百分之八十必需仰賴鄰國（尤其是泰國）走私進口（Mya Than 1996:3）。1988 年尼溫政府被迫下台，但是新政府仍由軍人所把持，許多高壓統治的手段仍然繼續存在。不過崩潰的經濟也迫使新政府做了一項重大的改變——開放國門以吸引外國人到緬投資和觀光；同時學術界也因此得到進入該國研究的機會。1990 年以後有關緬甸的出版品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緬甸研究這個領域終於可以被期待，只是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的研究出版都是聚焦於 1988 年以後緬甸的政治局勢與政策分析，以及多邊經貿發展的追蹤，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樣態研究卻相對地貧瘠；此外，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史被擱置遺忘，少有研究者投入心力去彌補這段學術的空窗。對於過去模糊的認識也導致對目前與未來無法深入剖析的缺失，這也是為什麼至今外界對緬甸社會的認識仍然是片斷、模糊與不解。因而當下的急務是進入不同地區、不同族群中進行田野研究，重新建構有歷史向度的生活文化史，雖然這也意味著莫大的挑戰與莫大的困難。

就研究題材來說，「日常政治」這個課題是洞悉民間主體能動性的一個重要切入點，這也是目前筆者的研究議題之一。不同於傳統政治學立基於國家中心主義從上而下的分析視角（著重在政府的領導、政黨組織、政策制定與執行、選舉活動、組織性示威等面向），日常政治所強調的是從民間的觀點出發，探究人民在面對政府的治理與外在強大的經濟壓力下，例如資本主義的衝擊時，所產生的交互關係與抗爭，尤其是過程中所凸顯出來的階級對立與衝突，以及奠基於親友關係（kinship）或恩侍（patron-client）關係的網絡連結（Scott 1989，1990；Kerkvliet 1991，2005）。這樣的觀點翻轉了國家至上的必然合法性，不但透視下層社會的能動性，更關注到社群中的個別主體（individuals）。

以下筆者將以兩則報導人所提供的小故事來分析緬甸的日常政治，在這兩則故事中我們將看到民間在面對緬甸政府壓迫性的治理下，所產生出的不同層級的衝突與對應——有族群叛軍，有政府所認可的自願軍（Ka Kwe Ye，或簡稱 KKY），不同的軍事團體有合作也有對立戰爭。看似不同的權力組織與個別平民百姓，實際上彼此間的分野卻又未必是固定不變；他們的角色在游移變換，而交替的過程中又不斷呈現彼此間生存策略的運用與資源的奪取問題。第一個故事是由過去一位雲南裔的 KKY 領導人所敘述，他的故事清楚地指涉出這樣的複雜性。

我們那時候很苦很苦，不死就算我們的運氣好，政府賣給我們便宜的物資，我們再轉賣，買 10 萬緬幣，可以賣 20 萬，有時候比一倍還多。參加 KKY 可以向緬甸政府申請購買各種物資，包括洋紗、大米、油、水泥、汽車輪胎、鹽巴、糖、煙葉、衣服、麵粉、花生、玉米、單車、吉普車，什麼都有。吉普車是二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一輛只要一千多緬幣。那時候緬甸大卡車一輛才幾千塊緬幣。我們也課稅，是跟地方百姓收稅——農作生產的 20%，都是大煙稅。長青山是出大煙最好的地方，收成的鴉片交公家一半，私人一半。那時部隊有三百多個兵，其中 150 人負責種地，另外 150 人負責打仗，全部的兵平均均分，也就是那 150 人種的也要分給另外 150 人負責打仗的。從 1969 年到 1972 年常常有打仗，我們的部隊配合區域內一個政府軍部隊，也是三百多人，一起打仗。緬甸軍不種大煙，他們的開銷都由國家補給。可是緬甸兵很壞，會擾民，但在我管轄的區域內，他們不敢亂來，我的管理哲學是「壓強提弱」。

各地的 KKY 部隊分別成立、運作於 1963 年到 1973 年之間，緬甸政府收納這些地方武裝團體，用來打擊緬共和其他族群叛軍。然而許多 KKY 同時與政府軍和不同叛軍往來，跨境馬幫商隊更是需要尋求他們的保護。上述的故事指涉出緬甸的日常政治糾結於不同層級間的合作與對抗，個人或團體游走在不同的勢力之間，試圖謀求最大的生存利益；而這個生存利益的最大來源即是地下經濟所發展出的黑市交易，它包含了泰國（或其他鄰國）進口的日常生活消費品，以及從緬甸出口的天然資源（例如木材、礦產）和鴉片毒品等商品。不管是個人、民間武裝團體或

國家政府、軍方人員，都共同參與了這個地下商業活動。下一個故事是由一位退休的雲南馬幫商人所講述，他的故事正呈現出這樣的交匯。

緬甸政府搞社會主義是幫了我們雲南人的忙，緬甸需要外國的物資，因為自己本國的都快沒收完了。要不是緬甸搞社會主義，我們雲南人永遠幫人打工，也不會跑到泰國去。泰緬馬幫走私的大多是雲南人，佔 60~70%，擺夷和其他少數民族（喀倫、山頭、崩龍、儼黑、栗索）大概佔 30%。緬甸人很膽小，真正敢跑走私的就是這些百夷山的雲南人，他們從中國逃難過來都敢，跑生意有什麼不敢……

在玉石買賣過程中都是先向緬甸政府人員講好的，例如去跟某個大人講這一天我要出多少貨，他會告訴你：「啊，這些是哪些小頭頭負責關卡，你去跟他說。」說好後付了錢給小頭頭，這些下面的人再去分給上面的人，吃錢是整個單位吃……

緬甸很貪污，只要給錢就好辦事。有一次我去緬甸，可是沒有帶東西過去，在過一個檢查站的時候，那裡的軍人還跟我說：「這次你怎麼沒帶東西來？不用怕，你只要給我們稅，就可以過。」

這位報導人的敘述刻劃出泰緬雲南移民如何去面對、扭轉不利的政策與局勢，發展出泰緬地下經濟交易，並成為這個跨境貿易網絡的主體。更有意思的是，這個地下經濟體系同時廣泛地收納了緬甸官方人員，那些最上層的政策制訂者也在違法消費外國走私進口的奢侈品，而各單位的監督者也努力尋求「地下稅收」，用來補充他們微不足道的官方薪水，如此一來，執法者也成為違法者。

總括來說，從日常政治的視角我們看到緬甸地下經濟的實踐成為對抗國家制度的一項普及抗爭 (a prevailing form of resistance)，它不但包含了平民百姓和民間武裝團體，同時也包含了國家政策的執行者，而這樣的矛盾又暴露出「合法」與「非法」的可議性。可惜的是地下經濟這個形式的抗爭雖然普及卻從來沒有凝聚成一股共同的政治力量，來推翻緬甸的軍人執政，它的普及只停留在個人或不同團體的利益追求上，而這些個人和團體又是彼此紛爭、對立。1988 年以後的新政府雖然在經濟政策上做了很大的改變，然而其政策的不合理、不穩定，加上不透明的管理與各單位的貪腐，致使走私貿易仍然成為全國的經濟主體。這樣的延續，如果沒有追溯到尼溫時期的社會經濟史，沒有從民間的日常政治視角切入，就很難真正了解目前緬甸社會的複雜局勢。緬甸是一個多族群的社會，至今各個族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研究仍然非常欠缺，然而這也意謂著緬甸研究潛藏著有待發掘、探討的豐富資料與理論可能。

References

- Kerkvliet, Benedict J. Tria. (1991) *Everyday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
- (1993) *State-village Relations in Vietnam: Contested Cooperatives and Collectivization*. Clayton, Vic., Australia: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In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Forest D. Colburn, ed. Armonk, N.Y.: M.E. Sharpe.
- Mya Than. (1996 [1992]) *Myanmar's External Trade: An Overview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ontext*. Singapore: ASEAN Economic Research Unit,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